

2004

# 中国诗歌年选

SELECTED CHINESE  
POEMS 2004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编

王光明 编选



花城出版社

# 2004 诗歌

2004

# 中国诗歌年选

SELECTED CHINESE POEMS 2004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编

王光明◎编选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4 中国诗歌年选 /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编: 王光明  
编选.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 3

ISBN 7-5360-4532-8

I. 2... II. ①中... ②王... III. 诗歌—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4731 号

---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技术编辑** 赵 琪

**平面设计** 苏家杰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厂

(广州市永福路 44 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4 1 插页

**字 数** 10,000 行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7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532-8/I·3611

**定 价** 26.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2004 年的诗：印象与评说（代前言）

**主持人：**王光明

**参加者：**张桃洲、荣光启、伍明春、刘金冬、赖或煌、邓庆周、黄雪敏、何玲、刘智群、叶敏娟、周炜贇、冯雷

**整理者：**赖或煌

**时 间：**2005 年 1 月 18 日下午

**地 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会议室

王光明：今天我们“读诗会”谈论的主题是“2004 年的中国诗歌”，这是一个比较大和宽泛的题目，不容易谈好。我自己也反感那种“年终总结”式的“宏观”述评和居高临下的“鸟瞰”，那往往是一条河流对于大海的观察，受着视野与角度的局限。但认真回顾与思考是必须的，因此，借编选《2004 中国诗歌年选》的机会，我先让同学们分头阅读比较有影响的诗歌刊物以及文学刊物的诗歌栏目，形成比较直接的和具体的印象。现在我们交流 2004 年中国诗歌的印象与评价，就从这具体的阅读印象出发。首先，由参加编选的同学报告各自对某个诗歌刊物或文学刊物的诗歌栏目的阅读感受；然后，各位对本年诗歌发展中关心比较多的某个现象或者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不同的角度，通过补充与对话，或许可以多少避免个人视野的局限。

## 一、2004 年的诗歌刊物

何玲（硕士生）：与往年相比，《诗刊》在 2004 年作出了不少改进。首先，“好诗共享”栏目由以前的“单翅”改为了“蝶翅”，从单选一篇经典之作、而且大多是外国作品，改为经典与原创并存。这有利于鼓励诗坛新人努力创作，激发他们创作的信心与勇气，同时也认清差距，更多地向经典学习。其次，增添的“诗歌演讲厅——在《诗刊》听讲座”，请著名专家学者、诗歌批评家讲座，以文字记录历史，流传声音，磋商诗艺，从思想上、艺术上和学术上对诗歌写作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这也提高了《诗刊》的学术含量，既有利于促进诗人的写作，又可以提高读者的诗歌鉴赏力。再次，在提供信息方面，新增的“刊中报——信息版”集中介绍诗歌动态，沟通诗人近况，选登编读往来，对读者了解国际国内诗坛、交流读诗感想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有利于使读者认识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很多优秀诗人在为诗歌努力，有众多的诗歌爱好者关注诗歌。

荣光启（博士生）：《诗刊》肯定是中国诗歌刊物中的“老大”，这个“老大”的意思不是发表在上面的诗和其他诗刊发表的诗相比是最好的，而是在很多诗人心目中这本杂志的地位。但诗人们对《诗刊》的态度又是矛盾的，一方面，大家都期望自己的诗能发表在上面，一方面不少人又骂《诗刊》。骂的理由一方面因为自己的诗歌上不去，另一方面也因为《诗刊》自身的原因。作为中国作协的主要刊物之一，《诗刊》在历史上对于一个时代诗歌的美学趣味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但对于 90 年代后期以来的当代诗歌，在有些理论家看来，其之所以呈现一种混乱无序的局面，和《诗刊》杂志没有起到很好的

“引导”作用有关。

**王光明：**荣光启说诗人对《诗刊》的态度是矛盾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应该把《诗刊》的特殊性考虑进去。《诗刊》自1957年创刊以来，是一个已有近50年历史的国家诗歌刊物。作为一种国家刊物，《诗刊》一方面似乎要代表这个国家的诗歌艺术水准，无论是它的自我定位还是公众期待；另一方面，正因为是国家刊物，它必定是主旋律的，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和公共精神的，同时是方方面面必须照顾周全的。不难看出，《诗刊》创办以来保持着两重性，面临着公共性与独创性的诸多矛盾。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诗刊》能不能形成自己诗歌的理想？这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但到现在为止，《诗刊》是否找到了它的艺术定位，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它推出的“每月诗星”，必须符合两条标准，既要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又必须是主旋律的。“诗星”的选择受着复杂而又矛盾的标准的限制，每一首诗是否都是好诗就很难说。当然，《诗刊》也做了不少改革，特别是下半月刊创办后；在我的阅读中，感觉一些诗还是不错的，语言比较老练和干净。《诗刊》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我提供这样的背景，是为了让大家注意这种复杂性。

**伍明春（博士生）：**何玲刚才谈《诗刊》似乎只谈了上半月刊，没有涉及下半月刊，其实它的上下半月刊在总体定位、栏目设置、选稿要求等方面是不大一样的。《诗刊》下半月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比如它的“结识一个诗人”与上半月刊的“每月诗星”就颇不相同，新锐而不失稳健；它的“校园版”对当前诗歌审美教育也有一定的推进作用，里面的“读诗会”和即将与《扬子江》共同推出的“第二课堂”值得关注。

**邓庆周（博士生）：**2004年是一个平凡的年头，对于居于四川盆地的《星星》而言，却是不平凡的。《甲申风暴·21世

纪中国诗歌大展》由《星星》诗刊以上半月合刊的形式推出。一如其名，颇有些轰响和抢眼，让人自然地联系起风起云涌、绿林聚会的 1986 年诗歌大展。我觉得可以如此来概括《星星》上、下半月刊的办刊特色：上半月刊“坚守——捍卫诗歌的高贵与良知”，下半月刊“出击——引领大众寻找生活诗意”。2004 年比较值得留意的有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悼诗——献给名叫洁白的姐姐》（杨邪）、关注重大题材和公共主题的《熟悉的姿势——怀念小平》（老铁）、被编者称作“以纯粹的抒情去接近诗歌的内核和本质”的组诗《二十四节气》（泽婴）等。这些诗也体现了《星星》在选稿方面的特点和取向。

“风暴”余波未息，4 月份《星星》下半月刊大刀阔斧的全新改版，再争诗界受众眼球。改版的结果是，《星星》2003 年推出的下半月网络版，在 2004 年第 3 期后宣告终结。4 月份下半月刊出现，读者的目光不禁为之一跳，封面居然是《电影之友》或时尚杂志才会有的靓女，这表明《星星》下半月刊的编辑方针完全改变了，实际上也给读者留下了“网络诗歌第一品牌”昙花一现的遗憾。

赖或煌（博士生）：《星星》下半月刊从号称创办“中国网络诗歌第一品牌”，到完全被改造为一个时尚的文化型杂志，颇发人深思。与其说这体现了决策者们直面市场、勇于尝试的胆识和智慧，不如说映衬了当前诗歌刊物的艰难、尴尬的处境。这似乎是个老话题了。《星星》下半月刊的变动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料想之中。

刘智群（硕士生）：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 2004 年的《扬子江诗刊》。作为一个创办于 1997 年，由江苏省作协主办的诗歌双月刊，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不少特色。该刊每期打头的“扬子江诗潮”，在这年推出了一些较有分量的诗人诗作。不

过,《扬子江》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大部分诗歌都是一些个人化的书写,缺乏时代感和当下经验,较少看到语言的雕琢和美丽。并且,诗歌的抒情功能在这本刊物里也没有得到多少体现。我认为它推出的比较值得肯定的诗人是湖北的余笑忠,第一期上刊登了他的长诗《俯首》(节选),生活的描写细腻,语言生动。值得一提的还有巴音博罗的《鸭绿江谣曲》、西渡的《晨跑者之歌》等。

《扬子江》刊发评论的栏目值得注意,特别是关于诗歌的随笔文章及对外国诗歌进行评论的“视角”。有一篇评论洛夫《漂木》的文章十分到位。我觉得评论要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要对当代诗歌的发展有建设性作用。面对尚未成型的现代汉语诗歌,评论更要具有这种品质。比较有建设性的是林茶居《诗歌的底线》、周伦佑《中国先锋诗歌向何处去》、敬文东《行话,对话,祈祷和词语的游牧特征》、李德武《创作断想》;尤其是西川的《曼哈顿随想——给张旭东》值得一读。

张桃洲(博士后):我觉得刘智群刚才所谈的《扬子江》对理论的重视,的确是这本刊物体现自己特色的一个方面。不过,我不大认同刘智群刚才对《扬子江》上的诗提出的批评,主要是诗歌观念比较偏颇。在这样一个年代,如果还片面地以抒情、以语言的雕琢为诗的旨归,一味地指责诗的个人化书写,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即便以抒情的质朴、动人来看,第5期刊发的鲁西西等人的诗作还是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再以打头栏目“扬子江诗潮”来说,这个栏目也是《扬子江》的一个特色栏目,所选入的作者大多是一些比较新锐的诗人,这些诗人都处在一个寻求突破的时期,他们的作品展示了他们探索的一种状态,因此给人的感觉不可能是非常“优雅”、“抒情”、“唯美”的,甚至可能会给人一种比较粗砺的印象。这个栏目力图不断推出一些新鲜而有力度作品,这一点也显出刊物本



身的活力。在遴选优秀诗作的前提下，不追求一种定型的东西，不追求一种全面的结果，这大概是刊物主编的一个定位或追求吧。

冯雷（硕士生）：谈论《诗潮》，不妨从它 2004 年第一期的一首诗谈起，这是杨子写的《出门》。在这首诗中，诗人用戏剧化的手法在“离开”与“目标”的矛盾和困惑的关节点上展开诗歌的知性抒情，很耐人寻味。在我看来，诗人的困惑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种迷失，是在摆脱过去面向未来的“大视野”中，对定位、方向的“模糊”。而这种“大视野”和“模糊”也正是我在回望 2004 年《诗潮》所刊发的作品后得出的一种印象式评价。

从栏目的设置上来看，《诗潮》在 2002 年和 2003 年都设有“中国诗歌高地”这一重要栏目，每期以专栏的形式集中推出来自同一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不同作家的一批作品。随着社会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和全球化语境下地区差异性的减弱，这种划分标准的无效性凸现得越来越明显。在 2004 年，《诗潮》改而推出“中国诗歌扫描”栏目，似乎是在试图从更高的高度鸟瞰共时态的现代汉诗创作全貌，更大范围地搜捕优秀诗作以飨读者。

2004 年的《诗潮》给人的总体感觉，假如以篮球场上的各个位置设比，它不同于明确定位于“前卫、前倾、前进”的一部分前锋似的刊物，同时与面面俱到、统辖话语的中锋似的刊物也有所区别，它更像一个篮球场上的后卫，视野不仅比较开阔，而且更加经济、有效。

刘金冬（博士生）：《诗潮》第 5 期有《当代汉语诗歌关键词》一文，对以前流行的一些诗歌词语进行了讨论。臧棣、周瓛、于坚、敬文东、朵渔等人对诸如“接受”、“技术”、“个人写作”、“叙事”、“中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等关键词发表

了各自不同的看法，虽然有交锋，但都比较理性，也带有一些总结的意思。听了刚才各位的发言我忽然想到，能否以一个或几个诗人为切入口，观察他们这一年在不同刊物上发表诗作的情形，进行比较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黄雪敏（博士生）：“先锋”的品质一直是《诗歌月刊》的精神气脉，它以“汉语语言”的质地作为检测先锋诗歌的试金石，凸现情绪、节奏、语感等因素。2004年的“先锋时刻”在作品的风格上有意地呈现出“黑白配”——挑选两种不同风格的诗作，常常是一扬一抑，一内敛一沉郁，一复杂一简单，在对比阅读中体现“先锋”的差异。

《诗歌月刊》在2003年5月曾举办过“新人新作大展”，但这种全方位集中展示的方法，容易变成强拼硬凑的东西。随后开设的“发现”栏目力图纠正这一倾向，将一些在普通栏目中得不到足够重视的年轻诗人凸现出来。他们采取的途径是对具体作品进行精简的“细读”。由于年轻诗人在创作中遇到的多是诗艺问题——“视力”的准确与“手法”的精确问题，故该栏目常针对“诗艺”的某一方面作出具体评价，甚至不怕刨根问底地揣测作者内心幽微的世界和表达上的某些缺陷。这种尝试在众多的诗歌杂志中是比较独特的。

阅读《诗歌月刊》，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诗作大多是一种远离乌托邦式的反神话写作，诗人坚持以口语入诗，更多的关注自身的问题，有意的回避了社会的主旋律，专注于发现与一己相关的人事情理。这些作品的汇聚，加上对民刊和网刊诗歌的重视和挑选，使《诗歌月刊》在总体风格上体现了一种“边缘”和“先锋”的色彩。这种“边缘”地位的坚持和“剑走偏锋”的作法为《诗歌月刊》赢得了数量可观的读者，当然也招来了不可避免的批评。

周炜贇（硕士生）：我选择了《诗林》和《山花》作为观

察对象。用《诗林》自己的话来说：它是一本“独辟栏目，推举新人，前卫先锋”的季刊。《诗林》让我们读到的更多是来自不同生活层面诗人的诗歌，而不仅仅是专业诗人世界里的经典名作。同时，《诗林》也是一个较充满青年性和当代性的开放式的诗歌杂志。这也就为其所提倡的“前卫先锋”提供了可能性。可以说，这种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为广大诗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发表心声的舞台，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的阅读提供了一个相当宽泛的视野和多元化的欣赏视角。但是，也使得人们对“何为经典”充满了疑惑。

与《诗林》相比，《山花》则给人以一种相当高贵的感觉。翻开“诗人自选”，明亮的页纸衬映着鲜明的诗行，顿时让人们的视觉接受了一次洁净的洗礼。《山花》的“诗人自选”请到的诗人好，诗人选的诗也好，它的成功，就一名读者看来，更多的在于它的优越的版本效果，及其作者的声誉和知名度。确切地说，《山花》选的不是诗，而是诗人。不过，《山花》2004 年的诗在诗作的力度等整体水平上似乎稍逊于 2003 年。中国的诗人多，可是好诗人却不多，何况有时最好的作品也不一定就是出自最有名的诗人。

叶敏娟（硕士生）：2004 年的《花城》一如既往地推出了一些好诗。稳重、大气、时尚、先锋，是我对它的总体印象。《花城》是为“大家”，有别于民刊，从所推出的诗中也可见出其态度的审慎，刊出的诗歌常有可圈可点之处。第二期于坚的一组诗，第三期李小洛的总题为《孤独书》的 24 首诗，第四期《词语中：时光挽留的往事》（江帆），第一期叶舟的组诗《大地的课堂》，也许正由于这些诗，使《花城》显得稳重、大气。这些诗虽不尽全美，却也趣味不低，十分耐读！

王光明：《花城》的诗歌品味历来是不低的，像它那样重视和认真经营诗歌栏目的综合性文学刊物还有《人民文学》、

《作家》、《天涯》等。而专门的诗歌刊物中，我觉得近一二年的《中国诗人》也办得不错，是我编选的“年选”选得较多的几个刊物之一。另外，有不少民刊也值得注意，像黑龙江的张曙光他们办的《剃须刀》，是非常追求作品本身的质量和效果的刊物，而广东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则分别推出了“读者最喜欢的十位女诗人”和葡萄牙诗人安德拉的专集，装帧与印刷非常讲究。湖北的《新汉诗》不仅有自己的诗歌主张，同时也以“讲诗堂”栏目争取读者对诗歌的理解，四川大凉山的《独立》则探索“诗歌地域”的可能性。《今朝》和《大风》一年四期按季出版，发表了不少值得注意的作品；《扬子鳄》则出了“记忆与印象”专号，推出诗人刘春对诗坛诗作的阅读感受，关注是非常广泛的。上海的《撒娇》得到了中国文联出版社的认同，夏季号印刷了2000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体现其“撒娇”风格。有人提出，从“莽汉”到“撒娇”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但我更期待“撒娇派”能在语言和想象方式上体现以城市感性戏谑为特征的精神品格和美学品格。中国城市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得非常迅速，但现代城市生活一直没有成为中国诗歌的背景与源泉，支配中国诗人的想象力。因此诗人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大多还比较简单直接。

## 二、2004年的诗歌现象、活动和问题

**荣光启：**2004年诗歌中出现了很多“新名词”，比如“垃圾派”、“第三条道路”……

**王光明：**它们作为一类现象值得注意。包括很多的诗歌活动、研讨会和评奖，北京大学诗歌中心的成立，多多、王小妮、江非被两所大学聘为驻校诗人，《诗刊》下半月刊与《扬子江》诗刊全年刊发首都师范大学“读诗会”的内容，《特区

文学》推出十位批评家的“诗歌联读”等。有些是“造势”的，有些却说明近些年沉寂的诗歌累积了某种期待。因为在大众传媒的时代，资讯泛滥，像叙事性的长篇阅读大家未必很有耐性，诗歌语言的魅力反而得到重视，对诗歌的期待也就变得强烈。另一方面，在 2004 年诸多诗歌现象中，是否隐含了某种清理、反思诗歌问题的倾向呢？即使在诗作中，也有大量诗歌问题的辩论，像臧棣的不少诗作，还有湖北诗人阿毛的好几首关于诗的诗作等，为了体现这种症候，我特意在“年选”中多选了一些。

荣光启：2004 年对于诗歌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年份。总的来说，在现象上诗坛表现出这样的状况：诗歌的写作空前繁盛，诗人、诗作之多一如既往。这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是诗歌刊物的作为，上面已经谈到。第二就是网络，只要你愿意上网，网上的诗歌诗人可活跃着呐，“好诗”随处可见，论战也经久不息。第三是民刊，一些诗人按照自己的趣味自费出版的刊物也值得关注。广西的《扬子鳄》、湖北的《新汉诗》等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第四是“派别”。在诗歌写作的立场和风格上，每一年都会产生许多稀奇古怪的派别，其主张往往是哗众取宠，诗歌写得很糟糕。总的来说，2004 年和 1999 年以来的几个年头相比，诗坛仍旧一如既往的热闹，但若以“诗”的标准来说，我们往往是“但见诗人不见诗”，好诗偶尔有几首，但不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4 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几年来诗坛所沉积的问题在慢慢显露出来，一些敏锐的诗人、理论家也开始寻思隐藏在这些问题当中的问题，有些人已经开始在做检讨和重建的工作，这是这一年里我特别愿意看到的现象。值得一提的是《江汉大学学报》上展开了一系列关于“新诗与传统”、“新诗的标准”、“新诗的文体”等问题的讨论，非

常值得关注。诗歌的本体意识的重视和本体话语的重建开始慢慢进入许多诗人、理论家的思想日程。可以说，这一年，当代诗歌在几年的混乱、喧嚣、无聊之后，开始萌生出一点与检讨历史、寻思“问题背后的问题”有关的新质。这是很值得欣慰的事。

**伍明春：**2004年的诗歌作品我读得不多，我想谈谈有关诗歌的谈论。我在有限的关注中，注意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2004年的诗坛，既有人在强调诗歌的“草根性”、“草根化”，又有人重提“先锋”话题。

所谓“草根性”，按照其倡导者李少君的解释，“决不仅仅是民族之根，传统之根，其实更多是个人的自我之根。只有从个人的自我之根开始，才可能创造出真正独特的具有原创力的诗歌。”这里所说的“草根化”，在我看来，不过是“本土化”的换一种说法而已。倡导者在文章中对这个观点的具体论述存在不少漏洞。比如，他所列举的代表诗人的作品，真的能支撑得起一个全新的诗学命题吗？再说进一步说，这个命题本身是否具有一种“合法性”？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辨析和思考。

关于先锋话题，先谈谈10月份的“上海先锋诗歌研讨会”。主办者的初衷，显然是想对上海先锋诗歌的成绩作某种总结。然而，这次会议却几乎变成了对“先锋”这一名号的清算。这种错位现象表明，是对“先锋”的当下意义进行反思的时候了。比如，洪子诚教授就对先锋这一概念在当前能否成立提出了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先锋”在当下语境中，往往成为一个被掏空了内涵的空壳。

所谓诗歌“草根性”的提出，和先锋话题的回潮，两者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都向我们提示了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某种内在焦虑。

**赖或煌：**我关注的是，近年来累积在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

的老问题怎样被重述了，比如某些诗歌观念被重新提出。我关注其中的一些问题，不是因为这些讨论体现了多大的建设性，相反，其中凸现出了许多迷思，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出一些可以进行反思的话题。

这些讨论涉及的一个问题是，究竟应该写作主观的诗还是客观的诗？有论者认为写客观的诗是可耻的谎言，因而强调写得更主观一些。这里不妨把看待问题的方式转换一个角度。如果说，许多年以来中国诗歌曾经在抒情方式上出现了问题，比如对外部空间不够重视而后才会有强调有待发掘、扩大外部世界在诗中的位置，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历史的压力使诗歌必须展开更为开放的格局，从另一方面来看，未尝不是诗人调整观物方式、写作趣味之后的结果。因此，如果的确有一种更强调“客观”的写作的出现，那么，这种“客观”也是“主观”发现的结果。更准确地说，1990 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的变化，体现了对主体和客体的双重反思。

**刘金冬：**我想从 2004 年诗人的诗论谈起，并从这些诗人的诗论出发引出这一年的诗歌问题。总的说来，那些成名诗人都很活跃，他们对诗歌的一些根本问题都发表过比较系统的个人见解。这些见解对比他们以前的看法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可能更理性、更辨证一些。我大略把诗人诗论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诗是什么”、“诗人何为”这个问题的回答；另一类是从诗歌文本或诗歌问题出发，更多地涉及诗歌写作的内部问题。

**张桃洲：**我简单地谈谈阅读 2004 年诗歌的一点观感。我的整体感觉是，现在写诗的人很多，写得不错的人也很多。诗人们可以把词语写得很优美、很光滑、“很好看”，但一个致命的问题是，缺乏给人以震撼之感的诗人和诗作的出现。当然，这或许是 90 年代以来诗歌状况的延续——新诗在慢慢积蓄自己的力量，慢慢地发生一些也许是细微的变化，而我们还无法

很快地感悟到其中的全部。我们还看不到能够一下子从一般写作中脱颖而出的那极少数诗人。尽管某些刊物也推出一些新人，尽管也有一些诗人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他们的写作很快成为自己或他人的复制对象，马上被平面化了，这是很要命的问题。

另外，我想单独就一个方面来谈谈这一年的诗歌，事实上也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诗发展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刚才各位谈诗歌刊物时比较宏观，对单个诗人的状况把握不够。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一些诗人个案，从他们的写作中看到当代诗歌发生的一些细微变化，并且慢慢地体会到新诗写作的某种趋向。比如像朱朱这样的诗人，他前期写作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在词与物的关系上非常紧张，要求语言的犀利、尖锐，非常看重像刀子那样锐利的语言品质，有一种很“脆”的质地里边。但 90 年代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他的写作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是语言慢慢变得松弛了。松弛不是指诗歌缺乏力度，而是说他把原来那种紧张的词与物的关系舒缓了，把表面上刺一样的东西放到语言内面去了，语言的尖锐被内化了。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这些变化会对以后的新诗写作发生什么意义，这是需要我们探讨的。在我看来，这种变化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放弃原来单纯地致力于语言效果的企图，试图转向对诗与世界关系的重建。我觉得这是新诗很重要的一个趋向，也许是新诗寻求突变的突破口吧。

**王光明：**2004 年在许多方面的特色都可能是过去一些年的延续，比如比较分散的个人角度和不同风格不同趣味的探求。我在上月海南召开的“当代汉语诗歌研讨会”会上，发言的题目是“在个人主义的时代写诗”。“个人主义的时代”和“个人的诗”在概念上是不完全一样的。与个人主义时代直接



相对的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时代的联结纽带是政治和共同信仰，主要活动形式是运动与集会；而个人主义时代的联系纽带是经济利益，关心的问题主要是资源和利益分配，交往空间主要在市场。个人主义时代有更多自由和复杂的东西，还远没有被我们意识到，包括公共空间的社会交往和想象问题的方式。因此，在那个会上，我也对另外一个问题提出了看法，“民间”和“知识分子”之争，在个人主义时代是否可以得到延续？“民间”、“知识分子”和“官方”是对立的，这种对立主要问题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形成了非常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现在这种权力关系的形式仍然存在，在许多领域仍然有效，但权力关注的重点已经转移，思想与文化被经济利益挤向了社会的边缘。过去的问题是不许你说话，而现在可以说话了，可是没什么响应，甚至没有多少人听。你不妨去了解一下，二十年前《诗刊》发行多少万份，现在又发行多少万份，或者把文学杂志与时尚杂志和购物指南的发行状况做一番比较，你就不难发现，现在的问题不是不让诗歌说话的问题，而是诗歌怎样说话，如何重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过渡时期，也许《诗刊》与《诗歌月刊》、《中国诗人》仍然存在着不少区别，但被新闻出版署批准的“官刊”与同人出版的“民刊”在诗歌品格上的区别真的有那么大吗？

我一直对“民间”和民刊抱着怀旧式的和现实的敬意，它们推动了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曾经是思想文化的先锋，如今也仍然是个人主义时代一种特色鲜明的表现形式，因此它们也是“年选”的选择对象。不过，文化语境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包括民间诗人和知识分子诗人在内的身份关系已经十分吊诡，思想的独立性与否只能以思想本身来证明，而不是靠姿态与“站队”来说明，就像诗人的成就必须以诗作的优秀而不是发表在何种刊物来决定一样。说到诗，我还想进一步言明：思